

阁楼中的异托邦：

论《道林·格雷的画像》中的空间僭越与身份坍塌

周维炜 (Zhou Weiwei)¹

摘要：作为王尔德最具颠覆性的美学宣言，在福柯异托邦理论视域下《道林·格雷的画像》中的阁楼重构为兼具封闭性、矛盾并置与暴力性的坍塌场域。通过研究，阁楼不仅是对沙龙虚伪表象的补偿性空间，也是道德僭越、阶级符号消解与身份压抑的“暗柜”。其通过割裂公共与私密领域的空间实践，将社会规训内化为自我监视机制，最终导致主体性的异化与崩解。该空间政治阐释揭示了阁楼的双重暴力本质：既庇护道德僭越，又协同权力规训，深化了王尔德对维多利亚伪善的批判。

关键词：异托邦；《道林·格雷的画像》；空间；身份

Title: The Heterotopia in the Attic: On *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s Spatial Transgression and Identity Collapse

Abstract: As the most subversive aesthetic manifesto in Wilde's oeuvre, the attic in *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 is reconstructed as a collapsed spatial field characterized by enclosure, contradictory juxtaposition, and violence through Foucault's heterotopia theory. Through analysis, the attic emerges not only as a compensatory space offsetting the hypocritical facade of the salon but also as a "dark closet" that conceals moral transgressions, dissolves class symbols, and represses identity. By severing the connection 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 spheres through spatial practices, it internalizes social discipline into a self-surveillance mechanism, ultimately leading to the alienation and disintegration of subjectivity. This spatial-political interpretation reveals the attic's dual violent nature: while sheltering moral transgressions, it simultaneously collaborates with power discipline, thereby deepening Wilde's critique of Victorian hypocrisy.

Keywords: Heterotopia; *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 spatial; identity

引言

在文学批评的空间转向浪潮中，维多利亚哥特小说中的封闭空间逐渐被视为权力规训与道德压抑的象征载体。奥斯卡·王尔德 (Oscar Wilde) 的《道林·格雷的画像》作为唯美主义与哥特传统的交汇文本，其空间书写却长期局限于视觉隐喻的单一阐释。学者们或聚焦道林伦理身份的困境 (聂珍钊, 2011)，或通过拉康式的解读剖析文本 (马翔, 2014) 等，却较少关注小说中反复出现的阁

Received: 24 Feb 2025 / Revised: 25 Mar 2025 / Accepted: 27 Mar 2025 / Published online: 30 Apr 2025 / Print published: 30 May 2025; Print ISSN: 3078-8129 · Online ISSN: 3104-5073 / by JLWE, Vol.1, No.1, 2025, pp.74-82.

¹ 周维炜 (Zhou Weiwei), 广州华立学院外国语学院教师, 研究方向: 英语文学与翻译。电邮: 13242347428@163.com。

楼空间对其主体的结构性破坏，如何成为身份崩溃的暴力场域。画像所在的阁楼通过“异托邦化”的空间机制，将道德审判从社会外部规范内化为个体的自我监视系统。这一空间既是道林分裂主体的物质投射，也是维多利亚时代的权力对越轨者进行规训惩罚的隐喻。该研究缺口不仅忽视了王尔德对现代性空间暴力的深刻批判，也限制了异托邦理论在文学批评中的实践可能。

本文借鉴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异托邦（heterotopia）理论，试图突破传统道德批评的单一视角，重新审视阁楼空间的叙事功能。福柯（1986）将异托邦定义为“真实场所中被有效实现的乌托邦”，其通过矛盾并置颠覆主流空间秩序，进而重构主体与权力的关系。这一理论为解读阁楼提供了全新路径：它不仅是道林藏匿罪证的物理容器，更是一个充满僭越性的异质空间——既是对沙龙、剧院等公共领域虚伪表演的补偿，也是对维多利亚时代阶级、道德与性别规范的隐秘反抗。通过细读小说中阁楼的空間表征及其与道林身份危机的互动，本文试图论证：阁楼作为异托邦，通过空间割裂与权力渗透，最终导致道林自我认知的彻底崩溃。

一、阁楼作为异托邦的空间表征

在奥斯卡·王尔德的《道林·格雷的画像》中，阁楼这一空间绝非简单的物理容器，而是通过其独特的空间表征成为道林·格雷身份坍塌的核心场域。它不仅是一个藏匿罪证的隐秘角落，更是一个通过矛盾并置与权力渗透颠覆维多利亚社会规范的异质空间。其封闭性、污秽性与不可见性，与沙龙的光鲜表象形成尖锐对立，进而成为道林双重身份的分裂与重构的暴力场域。

1. 阁楼的物理属性与功能属性

从物理属性而言，阁楼的封闭性直接挑战了维多利亚时代对秩序可见性的迷恋。小说中，阁楼被描述为终年锁闭的房间，其腐朽的木质地板、霉菌滋生的墙壁与楼下沙龙中镀金镜框的华美和香槟杯的流光溢彩形成鲜明对比。这种空间割裂不仅是物理层面的隔离，更暗示了道林内在自我与社会角色的断裂。正如 Soja（1996, p.68-69）在讨论“第三空间”理论时所指出的，第三空间是一个彻底开放的空间，一个社会斗争的空间，在这里所有的边缘和外围都可以成为抵抗和重构的中心……它是一个有意识的生活空间，挑战二元思维的固定边界。而阁楼通过其不可进入性，将道林的道德堕落与衰老恐惧转化为一种具象化的禁忌。当道林用手掀开用来遮住画像的紫金色帘子时，空间的封闭性与画像的动态腐败形成张力，暗示了异托邦对主体的侵蚀。每一次阁楼的开启，都是一次对自我认知的暴力审视，其身份在圣洁与腐败的拉扯中逐渐崩解。

阁楼的功能属性进一步强化了其异托邦特质。作为藏匿画像的场所，它不仅是道林隔绝社会凝视的屏障，更是其真实欲望的宣泄场域。画像面容逐渐扭曲，沾染血污，道林试图通过将画像囚禁于阁楼，将道德污名与衰老的恐惧一并封存。然而，这种隔绝并非单纯的逃避，而是一种对公共领域虚伪性的补偿机制。沙龙中的道林扮演着唯美主义圣徒的角色，其言行举止遵循上流社会的礼仪规范，阁楼则成为其释放本我欲望的“暗柜”。王尔德的颓废美学通过去物质化揭示存在的虚无，而阁楼的空間实践恰恰暴露了这种矛盾——道林通过将堕落行为与光鲜表象割裂，试图维持其社会身份的完整性，却最终导致自我认知的彻底坍塌。这种双重性呼应了福柯（1986）对异托邦“补偿性”功能的阐释：通过创建一个与现实空间相对立或补充的空间，来弥补现实中的缺陷或不足。阁楼既是对虚伪社交空间的替代性补偿，也是对主流道德规范的隐秘反抗。

2. 阁楼的异托邦特征

异托邦的矛盾并置特征在阁楼中尤为显著。画像既是青春永驻的圣像，又是道德堕落的具象化

证据。当道林凝视画像时，他面对的不仅是肉体的衰老，更是灵魂的腐化。这种圣洁与污秽的共存，打破了维多利亚社会对美与道德的二元对立想象。小说中，腐败的甜腻气味与沙龙中香料的矫饰气息形成强烈对比，揭示了王尔德对现代性空间暴力的批判——感官美学与道德污秽的共存，这恰是维多利亚时代压抑机制的缩影。阁楼中的气味不仅是腐败的象征，更是一种对公共空间虚伪性的无声控诉：沙龙中的香气掩盖了道德的虚无，而阁楼的腐臭则赤裸裸地暴露了堕落的真相。

阁楼空间的矛盾特质还体现在与道林身体经验的互动中。当道林频繁出入阁楼时，其身体逐渐成为权力渗透的载体。每一次触碰画像，都是对自我身份的重新确认与否定。这种身体的参与性，使得阁楼不再是被动的容器，而是主动参与主体性建构的权力场域。禁闭空间通过隔离与暴露的双重机制塑造主体，而阁楼正是通过这种动态的僭越，将道林推向自我认知的彻底坍塌。例如，当道林最终在阁楼中“抓起刀子，向画戳了过去”（王尔德, 2019, p.279）时，这一暴力行为不仅是对画像的毁灭，更是对自身存在的否定——阁楼成为他最终身份解体的剧场。

当阁楼空间被纳入维多利亚社会的权力网络，其异托邦特质便演变为自我规训的暴力装置。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城市：沙龙、剧院与鸦片馆并存，光鲜与堕落交织。王尔德却在其文学创作中赋予阁楼这一传统建筑空间以深邃的象征意蕴。它不仅突破了砖木结构的物理局限，更演化成连接现实与幻想、理性与癫狂的阈限空间。在此过程中，阁楼逐渐显露出其作为意识交汇场的特质：斑驳的墙体成为映射灵魂褶皱的镜面，尘封的角落孕育着被主流社会排斥的隐秘欲望，这种空间转化暗合了福柯（2006）所述的“异托邦”特质：“将几个彼此矛盾的场所并置于一个真实空间中”。在维多利亚时代严苛的道德帷幕下，阁楼既是囚禁肉身的牢笼，又是精神越界的暗道。当道林·格雷的画像在阁楼显影腐坏时，具象的空间已然升华为承载灵肉博弈的戏剧舞台，物质性的门窗转化为感知维度的界碑，最终使阁楼成为挑战社会规训的越界场域，诠释了唯美主义对传统道德空间的诗学颠覆。阁楼通过其私密性将这种越界推向极致。与公共空间中的表演性不同，阁楼的封闭性允许道林在绝对孤独中直面自我。这种孤独并非解脱，而是一种更深刻的禁锢——当社会凝视被隔绝，道林不得不面对内在道德的真空。阁楼既是为纯粹美学生活构筑的象牙塔，又是人性阴暗面滋生的培养皿。正是这种空间的双重性，使得阁楼在提供审美庇护的同时，也悄然转化为道德堕落的加速器。画像中日益狰狞的面容如同被囚禁的镜像幽灵，在封闭空间的反复折射中不断强化着主客体分裂的认知危机。这种空间化的自我凝视最终导致主体性在审美异化中崩解。福柯曾以圆形监狱为例，揭示空间如何成为权力的具象化载体：“权力应该是可见的但又是无法确知的……即使监视者缺席，圆形监狱仍可有效运转”（周和军, 2007）。阁楼作为私密空间的极端形态，恰似边沁设计的全景敞视建筑，通过“隔离与可见性”的双重机制，将权力内化为自我规训的工具。当道林于阁楼中直面画像时，其主体性在“可见的凝视”与“无法确知的监视”间彻底瓦解，印证了福柯的论断：“每一座城市都是一座‘监狱之城’……国家机器建立在小范围的、局部的、散布的圆形监狱体系之上”（2007）。

当道林在阁楼中死亡时，这一空间完成了其暴力使命——它既是罪证的藏匿所，也是身份终结的墓穴。王尔德通过阁楼的叙事，不仅批判了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伪善，更预言了现代性空间中个体存在的困境：在异托邦的矛盾并置中，主体性终将被权力与欲望撕裂。

二、空间僭越：阁楼对维多利亚秩序的颠覆

小说中的阁楼不仅是道林身份坍塌的异托邦场域，还是一处通过道德、阶级与性别三重维度的越界实践颠覆维多利亚社会秩序的暴力空间。这一隐蔽的角落，通过隐匿罪行、消解阶级符号与挑

战性别规范，成为挑战主流权力结构的“反叛据点”。王尔德以阁楼为叙事支点，将维多利亚时代对秩序、道德与身份的规训置于解构的刀锋之下，揭示了现代性空间中潜藏的颠覆性力量。

1. 道德僭越：司法权威的瓦解与罪证的隐匿

阁楼作为道林犯罪行为的物理载体，直接瓦解了维多利亚社会对司法空间权威的信仰。当道林在阁楼中用刀刺向巴兹尔·霍尔沃德并藏匿尸体时，这一行为不仅是对个体生命的毁灭，更是对司法空间神圣性的亵渎。在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想象中，犯罪应当暴露于公共审判的光明之下，而阁楼却通过其封闭性与不可见性，将谋杀转化为一场私密的仪式。当道林在阁楼实施谋杀并与艾伦·坎贝尔完成尸体防腐的黑色艺术时，这种发生于物理空间中的双重遮蔽（既遮蔽犯罪现场又遮蔽司法介入）实质上形成了对公共审判制度的戏仿。异托邦“总是必须有一个打开和关闭的系统，这个系统既将异托邦隔离开来，又使异托邦变得可以进入其中”（福柯，2006）。阁楼正是这样一个“关闭系统”，其私密性隔绝了外界的窥视与司法介入。道林通过掌控空间的可见性参数，将谋杀转化为“自我赋权的仪式”，恰如福柯所述：“所有人都可以进入这些异托邦的场所，但老实说，这仅仅是一个幻觉”（2006）。阁楼看似开放，实则通过封闭性排斥了法律对罪证的追踪，使尸体与罪行在空间中被割裂。阁楼墙体不仅隔绝了尸体的腐臭，更切断了法律惩戒机制与犯罪事实之间的认知链条，使得道林得以在沙龙社交场持续扮演道德完人，这种空间政治学暴露出维多利亚司法体系的内在悖论：当犯罪证据的能指（尸体）与所指（罪行）在私密空间中被强行割裂，建立在实证主义基础上的司法权力竟沦为需要罪证自我呈现的被动存在。在阁楼中，道林隐藏尸体、隔绝外界等行为控制了空间的可见性，实现了对司法权威的消解：尸体腐烂于阁楼，而道林仍以无瑕的容颜游走于沙龙，成为道德秩序崩塌的活体象征。

阁楼对道德秩序的颠覆还体现在其与宗教空间的类比中。它是“真实存在的‘反一场所’……承载着某种强烈的相异性和某种对立或对照的标志”（阿兰，2016）。小说中，画像被道林视为“灵魂的镜子”，而阁楼则成为供奉这一“堕落圣像”的禁忌神殿，形成“异质混杂性”的空间。当道林用紫金色帘子覆盖画像时，这一动作既是对宗教仪式的戏仿，也是对道德神圣性的解构。私密空间通过将神圣符号与污秽并置，颠覆宗教伦理的权威。这种空间伦理的倒置在画像的功能嬗变中达到顶点：作为“灵魂的镜子”，它本应承担基督教告解室中神父镜鉴灵魂的功能，但在阁楼的封闭系统中，画像却异化为自我神化的媒介。福柯（2006）认为：“异托邦有创造幻象空间的作用，这个幻象空间显露出全部真实空间简直更加虚幻……”。它不仅颠覆了道德判断的自然正当性，更使阁楼成为纯粹美学存在的独特异托邦。道林对画像的凝视从最初的惊骇逐渐转变为鉴赏家观察杰作般的沉醉，这种观看姿态的转变暴露出唯美主义对道德判断的消解——当罪恶的痕迹在画布上不断绽放时，阁楼空间便完成了从审判场所到罪恶圣殿的转化。这种幻象空间彻底压扁了传统教堂的垂直神人关系，使阁楼成为“反教堂”的渎神异托邦。

2. 阶级僭越：贵族宅邸中的“反阶级空间”

阁楼的阶级僭越性，体现在其对维多利亚社会等级制度的隐秘反抗。作为贵族宅邸的一部分，阁楼本应遵循上流社会的空间逻辑——沙龙、画廊与书房构成展示阶级身份的舞台，而阁楼却成了藏匿底层污秽的容器，沦为被物化的边缘空间。道林在阁楼中囤积的鸦片烟具、谋杀工具与底层情人的信物，无一不暴露了贵族阶级光鲜表象下的堕落本质。阁楼本质上就是一种福柯意义上的异托邦，是“嵌入社会体制内的真实场所，它们的反表征甚至颠倒了常规空间的运作逻辑”（张锦，2018）。这些物件恰与楼下沙龙里雪茄的哈瓦那香气形成阶级符号的尖锐对峙——前者是僭越者向底层亚文

化的暧昧投诚，后者则是阶级身份表演的精致面具。这种底层物件与沙龙中阶级符号的并置揭示了王尔德对阶级伪善的批判。李赛乔、庞弘（2020）曾指出空间规划的等级性是通过位置差异强化权力结构，而小说中阁楼对阶级符号的消解，正是对这一理论的文学反叛，也是对贵族道德纯洁性的颠覆性表征——贵族阶层的道德纯洁性，不过是建立在将污秽驱逐至阁楼的基础之上。

另外，阁楼还通过空间实践重构了阶级权力的流动性。当道林·格雷将化学家艾伦·坎贝尔诱至阁楼处理巴兹尔·霍尔沃德的尸体时，这一密闭空间瞬间成为阶级秩序崩解的剧场。这一行为打破了贵族与平民之间的空间隔离。艾伦·坎贝尔的被迫参与，暴露了上流社会对底层劳动力的隐秘依赖：贵族需要借助“肮脏之手”维持其光鲜表象，而阁楼正是这种共谋关系的具象化。这种阶级权力的流动与反转，使得阁楼成为一座“反阶级堡垒”——它既收容贵族的罪证，又吞噬底层的道德良知，二者共同构成“资本主义抽象的、同质化的空间生产”（付清松,2013）的图景。当坎贝尔最终因无法承受道德重负而自杀，道林却继续出入沙龙时，阁楼空间见证的正是资本主义将人性异化为可置换零件的残酷本质。这种空间化的阶级操演，最终使维多利亚时代整个社会等级制度置于荒诞的境地。

3. 性别僭越：作为“暗柜”的空间政治

阁楼对性别秩序的颠覆，集中体现于其作为性别“暗柜”的隐喻功能。在维多利亚时代，非异性欲望被压抑为不可言说的秘密，而阁楼则通过其封闭性成为道林被禁锢的性别身份的象征。道林的欲望压抑不仅是个人悲剧，更是资本主义家庭制度对“非规范性取向”的系统性排斥。阁楼的隐秘性正是这一制度下被压抑群体生存状态的隐喻。当道林在阁楼中凝视画像时，这一行为不仅是自我审视，更是一种被社会规训扭曲的欲望投射。阁楼中的画像——那个“逐渐扭曲的男性面容”——成为道林被压抑的欲望的替身：他对画像的病态迷恋，实则是无法公开的欲望的转移与变形，是社会通过规训将欲望转化为隐秘的、自我毁灭的行为。每一次阁楼的独处，都是一次对性别规范的短暂逃离，但这种逃离始终笼罩在自我毁灭的阴影之下。道林对画像的迷恋和最终的死亡，既可视作为权力规训的后果，也是对生命权力的一种颓废式反抗。

此外，阁楼的暴力与性别表演的复杂性也存在紧密交织。道林在沙龙中扮演的唯美主义公子角色，依赖于对传统男性气质的夸张模仿——他谈论艺术、追求感官享受，却刻意回避任何可能暴露真实性取向的言行。而阁楼则成为其卸下面具的场所：在这里，他无需表演男子气概，反而通过与画像的私密互动，展露出一一种模糊性别的颓废美学。“幽闭的空间、昏暗的光线、童年的某种创伤情境，这些因素是诱发凝视的催化剂……当观视行为发生于一个幽暗的封闭空间，处于其中的观视主体……都容易被视像俘获与征服”（马翔, 2014）。阁楼中的道林既是凝视的主体，也是被凝视的客体，这种双重性打破了男性气质的单一性，将性别身份推向流动与崩解的边缘。

阁楼的僭越性最终未能真正颠覆维多利亚秩序，反而成为其暴力机制的共谋者。当道林在阁楼中死亡时，画像恢复原貌，而他的尸体则“面容憔悴，满脸皱纹，令人憎恶”（王尔德, 2019, p.281）。这一结局暗示了空间僭越的局限性：阁楼虽然短暂地容纳了道德、阶级与性别的越界，却无法逃脱社会权力的最终收编。阁楼的崩塌不仅象征着道林个体身份的终结，也宣告了维多利亚社会对越界行为的暴力规训——一切非常规的存在终将被驱逐或消灭，秩序的铁幕依旧高悬。

王尔德通过阁楼的叙事，既揭示了维多利亚秩序的虚伪性与压抑性，也预言了现代性个体的生存困境：在权力与欲望的撕扯中，僭越或许能短暂撕裂秩序的裂缝，却终究难逃被吞噬的命运。阁楼由此成为一面破碎的镜子，映照出社会规训的暴力本质与个体反抗的悲剧性宿命。

三、身份坍塌：空间割裂下的主体危机

小说中的阁楼既是道林双重生活的物理容器，更是其身份坍塌的暴力场域。这一空间的割裂性——沙龙的光鲜表象与阁楼的堕落本质——将道林推向自我认知的深渊。王尔德通过阁楼的叙事，揭示了现代性主体在权力规训与欲望撕扯下的终极困境：身份的分裂、空间的吞噬与主体异化，最终导向存在的虚无。

1. 自我分裂：优雅与堕落的双重表演

道林·格雷身份的分裂，根植于阁楼与沙龙的空间对立。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2009）曾提出“家宅”的垂直结构象征理性与非理性的说法：阁楼代表理性、升华的自我，地窖则是非理性的存在。道林的阁楼虽被巴什拉视为“理性空间”，但在小说中却成为堕落欲望的容器。在沙龙中，他是完美无瑕的唯美主义化身，以其俊秀的面容与优雅谈吐征服伦敦社交圈。然而，阁楼中的道林却化身为堕落的祭司，在腐败的气味与扭曲的画像前沉溺于罪恶的狂欢。这种二元对立的身份表演，并非简单的道德堕落，而是空间割裂对主体性的暴力切割。道林的“沙龙自我”与“阁楼自我”实则是维多利亚社会规范与个体欲望冲突的具象化。阁楼的封闭性本应庇护“升华的自我”，却因画像的腐化成为扭曲的镜像空间，非但未成为理性象征，反而沦为道德堕落的深渊。每一次从沙龙步入阁楼，都是一次身份的撕裂：他必须将社会凝视下的完美面具与私密空间中的真实欲望强行割裂，而这种割裂最终导致其人格的碎片化。

阁楼的封闭性加剧了这种分裂的不可逆性。每次道林锁上房门，独自面对画像时，他试图通过物理隔绝维持双重身份的平衡，却未曾意识到，封闭空间反而成为放大自我矛盾的棱镜，其隔绝性会强化主体对他者凝视的依赖，而道林对画像的病态凝视，实则是将自我客体化的过程。赵福生（2010）分析福柯的“凝视”理论时，以《宫中侍女》为例，指出“观察机制”如何将主体整合到“无所不在的空间化权力之中”。道林对画像的病态凝视，正是这种凝视权力结构的具象化：画像作为他者凝视的载体，通过“空间化权力”反向规训主体。镜子（画像的隐喻）作为差异空间“使我所在之处成为绝对真实，同时又绝对不真实”，这与道林通过画像完成“自我客体化”的过程完全一致。画像中的扭曲面容既是他的替身，也是他的审判者——阁楼通过这种自我与他者的辩证，将道林推向身份认知的混乱。最终，他无法分辨何者为真实：是沙龙中永葆青春的外壳，还是阁楼中腐烂的灵魂？

2. 空间吞噬与主体异化：阁楼的双重暴力机制

道林的身份坍塌，本质上是阁楼空间对其人性的逐步吞噬。画像的青春永驻看似是唯美主义的胜利，实则是人性异化的开端。当道林将灵魂抵押给画像时，他并未意识到，这一行为实则是将自我主体性让渡给空间化的符号，画像作为灵魂的容器，通过抽象空间通过符号和图像取代真实体验，最终导致主体的空心化（Lefebvre, 1991, p.307-309），从而完成了对道林人性的剥离——他的罪恶与衰老被转移到画像中，而肉体则沦为空洞的能指。阁楼成为这一异化过程的加速器：每一次罪行的实施，都在画像上刻下更深的污痕，而道林与“人性”的距离也随之拉大。这种人性湮灭在阁楼的感官暴力中达到顶峰。小说中，阁楼弥漫着甜腻的腐败气味，画像的面容因罪恶而肿胀溃烂。这些感官描写不仅是堕落的隐喻，更是空间对主体性的直接侵蚀，印证了“空间与其说是权力运作的基础，倒不如说是空间自身埋伏着自动而匿名的权力，权力在这个空间内弥散开来，通过这个空间达到改造和生产主体的效应”（谢欣然，2020）。阁楼的气味与视觉的冲击了瓦解主体的理性边界，道林

在其中的感官沉浸，实则是其人性被空间吞噬的过程。同时在 Lefebvre (1991, p.170) 看来，身体不仅在空间中存在，还通过空间生产自身，同时被空间所生产。当他的肉体逐渐与画像的腐败同步时，人性最后的防线也随之崩塌——阁楼不再是藏匿罪证的场所，而是异化人性的熔炉。

阁楼作为“反规训工具”的暴力性，印证了福柯所言异托邦将不相容的若干空间并置的特性。表面上它是道林逃避社会规训的避难所，实则通过封闭的空间设计将维多利亚社会的道德压抑内化为自我规训的枷锁。道林频繁出入阁楼、反复审视画像的行为，宛如福柯 (1999, p.226) 全景敞视监狱中“在被囚禁者身上造成一种有意识的和持续的可见状态”的缩影，实则是将社会规范内化为自我审判的仪式。每一次掀开帘子，他都在重复一场自我定罪的表演——阁楼通过这种仪式化的暴力，将其推向自我憎恶的深渊。另外，阁楼的暴力还与道林的权力幻想形成共谋。当他以上帝般的姿态操纵画像的腐败时，他误以为自己是空间的主宰者，却未曾意识到，这种操控实则是权力机制对其主体的反向规训。道林对阁楼的掌控恰恰暴露了他的脆弱：画像的每一次变化都在提醒他，所谓的主宰不过是权力游戏的囚徒。最终，当他在阁楼中刺向画像时，这一行为既是反抗，更暴露了异托邦“既冲突又反转”的暴力本质——空间在此完成了对主体的终极规训。

最终，道林·格雷的死亡，宣告了身份坍塌的终极形态。当他的尸体“面容憔悴，满脸皱纹，令人憎恶” (王尔德, 2019, p.281) 地倒在阁楼中，而“画上的人和不久前见到时一样，具有惊人的韶秀与俊美” (p.281)。这一结局揭示了空间暴力的讽刺性逻辑：阁楼通过吞噬道林的主体性，最终“净化”了维多利亚社会的道德秩序。然而，这种“净化”实则是秩序的虚伪胜利——画像的复原不过是权力机制对非常规存在的暴力抹除。主体的消亡往往被体制转化为秩序合法化的注脚，而阁楼的崩塌恰恰印证了这一批判。

王尔德通过道林的悲剧，预言了现代性个体的生存困境：在空间割裂与权力渗透下，主体性终将沦为一场徒劳的表演。阁楼作为异托邦，既是反抗的据点，也是规训的牢笼；既是欲望的宣泄场，也是人性的坟场。当道林在空间暴力中化为齑粉，我们看到的不仅是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伪善，更是现代人永恒的生存悖论——在秩序与僭越的夹缝中，主体性何以存在？

结语

《道林·格雷的画像》中的阁楼空间，通过福柯的“异托邦”理论透镜，揭示了维多利亚时代权力规训与个体欲望间的深刻张力。作为道德僭越、阶级颠覆与性别身份“暗柜”的复合场域，阁楼以封闭性、感官暴力与矛盾并置解构道林的自我认同：其隐匿罪行消解司法权威，收容底层符号暴露贵族伪善，并通过堕落圣像的凝视映射性别压抑。然而，道林的死亡与画像的“净化”宣告了僭越的悖论性终结——异托邦既是反抗据点，亦是规训牢笼，最终以空间暴力吞噬主体性。本研究尝试将异托邦理论引入唯美主义文学的空间政治批判，既深化了对王尔德现代性预言的理解，也为探索数字时代虚拟空间与身份危机提供了启示：在秩序与僭越的永恒撕扯中，人类如何安放真实的自我？

Funding: This research received no external funding.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 declares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References

- 阿兰·布洛萨、汤明洁 (2016): “福柯的异托邦哲学及其问题”,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31(05): 155-162+197。
- [Alain Brossat, Tang Mingjie (2016). “Foucault's Philosophy of Heterotopia and Its Problems”. *Journal of Tsinghua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31(05): 155-162+197.]
- 奥斯卡·王尔德 (Wilde, O.) (2019): 《道林·格雷的画像》, 孙法理译。湖南文艺出版社。
- [Wilde, Oscar (2019). *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 translated by Sun Fali.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 付清松 (2013): “空间生产·空间批判·空间权利——析列斐弗尔空间政治学的基本架构”, 《社会科学家》(08): 11-15。
- [Fu Qingsong (2013): “Production of Space · Critique of Space · Rights to Space—An Analysis of the Basic Framework of Lefebvre's Spatial Politics”. *Social Scientist* (08): 11-15.]
- 加斯东·巴什拉 (2009): 《空间的诗学》, 张逸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 [Bachelard, Gaston (2019). *La Poétique de l'Espace*, translated by Zhang Yijing.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 李赛乔、庞弘 (2020): “空间规训——理解米歇尔·福柯空间理论的关键概念”, 《中外文化与文论》(01): 209-221。
- [Li Saiqiao, Pang Hong (2020). “Spatial Discipline—Understanding the Key Concepts of Michel Foucault's Theory of Space”. *Cultural Studies and Literary Theory* (01): 209-221.]
- 米歇尔·福柯 (1999): 《规训与惩罚: 监狱的诞生》, 刘北成, 杨远婴译。三联书店。
- [Michel Foucault (1999).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translated by Yang Beicheng, Yang Yuany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 M.福柯 (2006): “另类空间”, 王喆译, 《世界哲学》(06): 52-57。
- [Michel Foucault (2006). *Des Espaces Autres*, translated by Wang Zhe. *World Philosophy* (06): 52-57.]
- 马翔 (2014): “《道林·格雷的画像》: 一种拉康式的解读”, 《浙江社会科学》(06): 136-141+97+159-160。
- [Ma Xiang (2014). *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 A Lacanian Analysis*. *Zhejiang Social Sciences* (06): 136-141+97+159-160.]
- 聂珍钊 (2011): “文学伦理学批评: 伦理选择与斯芬克斯因子”, 《外国文学研究》(06): 1-13。
- [Nie Zhenzhao (2011).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Ethical Choice and Sphinx Factor”.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06): 1-13.]
- 谢欣然 (2020): “权力与知识的空间化——福柯理论中的空间层域关系研究”, 《陕西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04): 19-23。
- [Xie Xinran (2020). “Spatialization of Power and Knowledge—A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of Spatial Stratification in Foucault's Theory”. *Journal of Shaanx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s)* (04): 19-23.]
- 赵福生 (2010): Heterotopia: “‘差异地点’还是‘异托邦’?——兼论福柯的空间权力思想”, 《理论探讨》(01): 45-49。
- [Zhao Fusheng (2010). “‘Differential Space’ or ‘Heterotopia’? — With a Discussion on Foucault's Theory of Spatial Power”. *Theoretical Investigation* (01): 45-49.]
- 周和军 (2007): “空间与权力——福柯空间观解析”, 《江西社会科学》(04): 58-60。
- [Zhou Hejun (2007). “Space and Power—An Analysis of Foucault's Conception of Space”. *Jiangxi Social Sciences* (04): 58-60.]
- 张锦 (2018): “‘命名、表征与抗议’——论福柯的‘异托邦’和‘文学异托邦’”, 《外国文学》(01): 128-138。
- [Zhang Jing (2018). “‘Named, Represented and Contested’ On Michel Foucault's Heterotopias and Literature Heterotopia”.

Foucault, M. (1986). Preface. "Of Other Spaces.", translated by J. Miskowiec. *Diacritics* (01): 22—27.

Lefebvre, H. (1991).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lated by D.N. Smith. Blackwell Publishing.

SOJA, E. W. (1996). *Thirdspace: Journeys to Los Angeles and Other Real-and-Imagined Places*. Blackwell.